

對宋黎明先生〈利瑪竇筆下“doi mappamondi piccoli”即《萬國二圓圖》——與徐光台教授商榷〉的回應

徐 光 台*

1936 年洪業 (1893-1980) 將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筆下馮應京 (1555-1606) 印 “doi mappamondi piccoli” 與《萬國二圓圖》加以糾連。筆者在〈利瑪竇《萬國二圓圖》與馮應京印 “doi mappamondi piccoli” 考〉中, 指出張京元請利瑪竇繪製的《萬國二圓圖》於萬曆三十五年 (1607) 秋刊印, 馮應京已於三十四年元月過世, 因此《萬國二圓圖》不可能是馮應京印 “doi mappamondi piccoli”, 切斷《萬國二圓圖》與馮應京印 “doi mappamondi piccoli” 的連結, 並從馮應京著作的歷史脈絡, 推論 “doi mappamondi piccoli” 是《月令廣義》中的兩小世界圖。此文引起宋黎明先生撰文主張利瑪竇筆下 “doi mappamondi piccoli” 即《萬國二圓圖》。2016 年 5 月 13 日筆者自《漢學研究》編輯部獲悉宋先生此文, 謹簡要回應如下。

根據耶穌會創始者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 的「遠距服從」,¹ 中國區負責人利瑪竇以第三人稱向耶穌會總會提出報告, 即文錚恢復其名稱的《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2016 年 7 月 20 日收稿, 2016 年 9 月 5 日修訂完成, 2016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Hsu Kuang-tai is a professor emeritus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 1 Steven J. Harris, “Mapping Jesuit Science: The Role of Travel in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 in John W. O’Malley et al., eds., *The Jesuits: Cultures, Sciences, and Arts, 1550-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p. 212-240.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包括蒐集中國資訊與傳教經歷和進展。第 4 卷第 15 章記載馮應京和李之藻（1565?-1630）兩位對中國傳教事業有關的朋友，其中提到馮應京刊印“doi mappamondi piccoli”。

宋先生雖肯定筆者發現《萬國二圓圖》出自張京元推動，卻試圖論證：「“doi mappamondi piccoli”……是利瑪竇繪製、張京元刊刻的《萬國二圓圖》，利瑪竇將刊刻者張京元誤記為馮應京。」以下根據宋先生提出的主要論述來分析他的論證。在結論中，他希望讀者「不可盲信利瑪竇」，試圖營造利瑪竇的記載是不可信的氛圍。筆者認為利瑪竇的報告如果記載有誤，只要提出證據加以修正即可，但是不宜誤讀史料，逕自臆測利瑪竇記載有誤。

第五節初始處宋先生提出張京元刊刻的「《萬國二圓圖》又名《萬國二小圖》，“doi mappamondi piccoli”為其準確的義大利文對譯。」將利瑪竇筆下“doi mappamondi piccoli”與《萬國二圓圖》綁在一起，認為《方輿勝略》「山海輿地全圖」是《萬國二圓圖》的摹本，逕自提出「張冠馮戴」說。

利瑪竇筆下的“doi mappamondi piccoli”……是張京元刊刻的《萬國二圓圖》；……，程百二《方輿勝略》「山海輿地全圖」是其摹本。利瑪竇晚年回憶錄中隻字未提張京元，而是說馮應京刊刻“doi mappamondi piccoli”並為之作序，堪稱張冠馮戴。

1606 年馮應京過世前提出《方輿勝略》這本博物式地理彙編作品的構想，程百二於 1610 年出版。黃時鑒與龔纓晏指出程百二在外夷卷中妄加篡改或添加他人文字。例如，萬曆三十一年（1603）馮應京為《兩儀玄覽圖》撰〈輿地圖敘〉，《方輿勝略》將名稱改為〈山海輿地全圖總序〉，改寫原文首句，末句插入「以屬程生百二，纂四夷奉貢種落於後」。² 加上該卷出現〈山海輿地全圖解〉與〈山海輿地全圖各國經緯度分略〉，將不同年代的圖文與序，統歸在「山海輿地全圖」通名之下。

關鍵處在〈山海輿地全圖解〉中「今合各州萬國作二圓圖」十個字，以及之前兩小幅不著名的圓球圖。在不知張京元請利瑪竇繪製《萬國二圓圖》時，黃時鑒與龔纓晏認為〈山海輿地全圖解〉出自《乾坤體義》中的〈天地渾儀說〉，文字基本上與《坤輿萬國全圖》（1602）和《兩儀玄覽圖》相關說

2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39。

明一樣，只是「今合各州萬國作二圓圖」十個字未見於《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或《乾坤體義》。因此不確定〈山海輿地全圖解〉是利瑪竇繪製此二小圓球圖時附有的，或是程百二刪節編錄的。³

宋先生讀過黃時鑒與龔纓晏兩難的疑慮，也清楚張京元請利瑪竇繪製《萬國二圓圖》，未附任何證據，就認為〈山海輿地全圖解〉「多出十個字……或許是利瑪竇專門為《萬國二圓圖》而添加」，進而主張〈山海輿地全圖解〉內容與張京元和徐光啓題萬國二圓圖序文「原為《萬國二圓圖》中的文字」，名稱是後人加上的。

《方輿勝略》中〈山海輿地全圖解〉有九頁半長，內容出自《坤輿萬國全圖》起始處的總論，⁴而不是較晚的《乾坤體義》(c. 1608)，證據在首句「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形如雞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⁵張京元提到利瑪竇「殫思竭力，為兩小圖，可懸座右」，宋先生可能沒想過：殫思竭力的利瑪竇怎麼可能會將原先作為巨幅世界地圖的總論，其中有許多文字配合兩個圓球式宇宙論的天地關係，附在只繪出地球的兩小圓球圖上，更何況兩小圖中哪裡還有空間來容納九頁半長的文字呢？依此，筆者認為可將〈山海輿地全圖解〉是利瑪竇繪製此二小圓球圖時附有的，從黃時鑒與龔纓晏兩難疑慮中刪除。剩下程百二在刪節編錄原先作為巨幅《坤輿萬國全圖》的總論時，添加「今合各州萬國作二圓圖」十個字，給予〈山海輿地全圖解〉名稱，在關鍵處進一步混淆了史料編纂，使其內容看似與《萬國二圓圖》中的文字有關。

一旦釐清關鍵處混淆的史料編纂，原先巨幅世界地圖的總論與《萬國二圓圖》二者是無關的。依此，宋先生的「張冠馮戴」說，僅憑個人臆測，未

3 同上註。

4 朱維錚稱《坤輿萬國全圖》最前面的說明為「總論」。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0），頁 217，註 1。

5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 165；明·程百二輯，《方輿勝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2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外夷卷 1〈山海輿地全圖解〉，頁 5b（總頁 367）。《乾坤體義》終將「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修改為「語其德靜而不移之性」。明·利瑪竇輯，《乾坤體義》（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n. 4897）），卷上〈天地渾儀說〉，頁 1a。筆者判斷〈山海輿地全圖解〉內容出自《坤輿萬國全圖》，而非《乾坤體義》。

提出任何史料佐證，執意將《萬國二圖圖》與利瑪竇筆下馮應京印的“doi mappamondi piccoli”又綁在一起。

利瑪竇報告不提張京元刊刻《萬國二圖圖》有其理由，因為此事對傳教事業無明顯助益。該事發生在萬曆三十五年，離《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撰寫時間不遠，利瑪竇不致於將張京元混淆為馮應京，宋先生的「張冠馮戴」說，只是個人臆測。

此外，宋先生還從 *matematica* 與 *mappamondo* 兩個語詞著手。利瑪竇於羅馬學院接受教育時，天文學屬於數學中的一支，地理學是一門與數學有關的學科，*matematica* 與天文學或地理學的關係，不是指稱關係，不宜如第二節名稱表示的「*matematica*：既指天文，也指地理」。從事中西哲學與宗教比較研究的沈清松教授，指出明末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利瑪竇首先通過語言習取將西學外推向異文化與宗教的中國。⁶ 在實際交流過程中，利瑪竇肩負跨文化的語言溝通，他學習中文與文獻，傳入西方宇宙論、數學天文學、曆法，以及多幅在地化的世界地圖，還得將中國事務與傳教報告給羅馬耶穌會總會。在其報告中，*matematica* 不限於西方數學的意義，將中國與數有關而長於風水、堪輿等部分加入。

類似地，表達世界地圖的 *mappamondo* 一詞，在利瑪竇將世界地圖在地化時也有了變化。為了說服中國士人，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加入九重天宇宙論、日月蝕圖與天文曆法等，備以辨偽中國相關傳統知識，這是他獨創的。就像 *matematica* 一詞的意義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有變化，*mappamondo* 一詞亦難免有變化。

整體而言，雖然利瑪竇筆下的“doi mappamondi piccoli”是個小題，筆者先前的論文將“doi mappamondi piccoli”與《萬國二圖圖》脫鉤，從馮應京文獻的脈絡推論出一個新的解答。宋先生反將利瑪竇筆下馮應京印“doi mappamondi piccoli”與《萬國二圖圖》又綁在一起，主要的論述在關鍵處不是誤讀史料或混淆史料編纂，就是僅憑個人臆測，假設利瑪竇記載有誤，提出「張冠馮戴」說，走的不像是史學研究的正途，亦未就論述的關鍵處帶來新的歷史知識。

6 沈清松，《對比、外推與交談》（臺北：五南出版公司，2002）；沈清松，《從利瑪竇到海德格：跨文化脈絡下的中西哲學比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